

## 佛圖澄山西遺迹考

溫金玉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

**提要：**兩晉南北朝，是佛教東傳中國後生根開花的關鍵階段，佛圖澄即是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初至洛陽，適遇「永嘉之亂」，乃「潛澤草野，以觀世變」。那麼，這個「草野」之地在哪裡呢？又是什麼因緣促使「以觀世變」的佛圖澄及時把握時機去面見石勒？當時群雄競立，逐鹿中原，為什麼佛圖澄所見是石勒而不是別人呢？所以如果能找出佛圖澄隱居之地，並分析當時政治、軍事發展態勢，其實也就破譯出佛圖澄之所以會面識石勒並輔佐後趙這一段因緣的契機。本文依據地方史文獻、金石資料、寺院遺迹、出土文物以及民俗傳說等來考察佛圖澄弘化遺迹，認為山西武鄉縣南山正是佛圖澄當年由洛陽至襄國的避難之地。由此決定了他輔佐石趙三十餘年的經歷，並有了建寺千座、授徒萬人的輝煌，實現了在民眾信仰領域將佛教提昇為主流意識的宏願，開創出中國北地特有的依附皇權推廣法化的弘法範式，為日後道安「依國主而立法事」的傳教行化鋪設了藍本，也為佛教的中國化鑄成了模範。這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佛圖澄一生所致力的是為佛法的弘傳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他的真正貢獻是為中國佛教埋設了燎原之火種，使佛教一樹百獲，大顯於中土。

**關鍵詞：**佛圖澄 山西 武鄉 南山茅蓬寺

兩晉南北朝，是佛教東傳中國後生根開花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佛教信仰形態由宮廷佛教向士人佛教，特別是民眾佛教轉型；佛教信仰圈由西來僧人向漢地百姓擴展；經論典籍的譯介亦由單本傳譯向系統性經典文本翻譯發展，可以說沒有兩晉南北朝祖師筆路藍縷、瀝血叩心的辛苦經營，就沒有慧日高懸、法海橫流的隋唐佛教的盛世氣象。

在中國歷史上，西晉王朝僅持續了半個世紀。西晉末年，皇室貴族為爭奪權利，爆發了「八王之亂」，導致了西晉的滅亡。其後，在北部中國的土地上，五個少數民族先後建立了十多個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次民族大融和時期。北方十六國政權大多扶植佛教，當時祖師大德高掌遠躡，弘宣法化，使佛教信仰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佛圖澄即是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 一、佛圖澄及其傳教活動

佛圖澄（二三二—三四八），西域人（《晉書》、《魏書》均謂天竺人），本姓帛（或謂姓濕）。自幼出家，於烏菴國（古印度屬國，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上游一帶）就羅漢入道。<sup>[註 1]</sup>據載「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sup>[註 2]</sup>。更於罽賓（西域國名，在今喀布爾河下游流域克什米爾一帶），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佛圖澄於西晉懷帝永嘉四年（三一〇）來到洛陽。他志弘大法，欲於洛陽立寺，適遇「永嘉之亂」，劉曜率匈奴兵攻入洛陽，帝京擾亂，立寺之願未果，乃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劉曜部將石勒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北），專以殺戮樹威，道俗遇害者甚眾。澄觀勒之殘暴，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訪知勒之大將郭黑略——石勒「十八騎」之一<sup>[註 3]</sup>，素奉佛法，遂先止於郭黑略處。略更從澄受五戒，執弟子禮。據《高僧傳》載，佛圖澄「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於掌中……」。又能「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因而郭黑略每從勒征伐，輒預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華夏），己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大喜，曰：「天賜也。」遂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服。澄因而進諫石勒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sup>[註 4]</sup>這一番勸施德政的話，使石勒更加悅服。因之中州胡晉，略皆奉佛。

永嘉六年（三一二），石勒採納謀士張賓之議而據襄國（今河北省邢臺市）。大興二年（三一九）十一月，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建立後趙國，以襄國為都。咸和四年（三二九）滅前趙，控制了北中國大部分地區。佛圖澄亦常隨左右，其間敕龍致水、勸宥段波、預言擒曜、誠勿食蔥、復活太子等事，使勒益加尊重。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三三〇），勒於襄自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更事澄彌篤，有事必咨而後行，尊號「大和上」。勒死後，石虎廢勒子弘而自立，是謂建武元年（三三五），並遷都於鄴（今河北省臨漳縣鄴鎮一帶），澄亦隨之入鄴，居宮寺，輔佐後趙政權，一直至圓寂。

佛圖澄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個有貢獻的人。首先他身處亂世，佛法慈悲救世的宗旨成為他當下最為迫切弘揚的主題；其次，佛圖澄的時代佛教仍屬初傳期，如何使更多的民眾接受佛法的教化，擴大其攝受範圍是其時所有祖師苦心勞思的關注焦點。我們僅從如下方面來緬懷祖師的法乳深恩。

### (一)化導二石 澤潤蒼生

十六國時，中州寇蕩，郡國分崩，本是一個戰亂時期，加之後趙統治者專以殺戮來壯大聲威，鞏固其統治，更加重這一情形。石勒、石虎在歷史上皆以殘忍濫殺而著稱，暴戾恣睢，伏屍流血。如永嘉四年（三一〇）石勒攻取白馬（今河南滑縣），坑男女三千餘人。永昌元年（三二二），石虎攻陷徐龕，坑降卒三千人。太寧元年（三二三）石虎擊敗晉將曹嶷，坑其卒三萬。《晉書》記載石虎執政時：「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註 5]佛圖澄目睹生靈塗炭，為拯民於水火，毅然杖策軍門，用慈悲戒殺的教義來勸導石氏施行「德化」，「不為暴虐」、「不害無辜」。據說有許多人因此而獲救，所謂：「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註 6]在佛圖澄的勸諫下，石氏之暴虐稍有收斂。如石虎曾問：「佛法云何？」澄答：「佛法不殺。」石虎說：「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佛圖澄為其解說：

帝王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  
[註 7]

澄所言石虎雖不能盡從，但終為益不少。

佛圖澄遷化之際，雖知「禍亂漸萌，石氏當滅」，仍苦口婆心勸化石虎實行德政曰：

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誠，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註 8]

佛圖澄一柱擎天，以慈悲不殺的勸諫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石氏的恣意濫殺，實現了其憫念蒼生、安定社會的濟世宏願。梁·慧皎法師在其《高僧傳》中評曰：

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註 9]

唐·道世法師在其《法苑珠林》中讚曰：

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註 10]

元·念常法師在其《佛祖歷代通載》卷六中論云：

觀澄公區區西來，當石勒、季龍（石虎）殄暴虓噬之際，而能憫物垂軌，示以玄言德祥，導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於戲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註 11]

近人湯用彤先生亦評佛圖澄說：

其行化時，五胡之亂最烈，石勒殘暴，實為流寇。澄憫念蒼生，以方術欣動二石，以報應之說戒其兇殺。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是則釋氏饒益即未驗於來生，而由澄公已有徵於今世。[註 12]

古今讚語均是對佛圖澄慈憫百姓功績的肯定。

## (二)正法得立 民聽入道

民族融和往往伴隨著戰爭與流血，個中因由，除政治、經濟機制不同外，還有民族間文化心理的差異。但後趙時期的這一民族融和過程卻因有佛教的因素而大大減少了大規模的殺戮事件。反而隨著佛教的普及發展，在各民族間有了一種意識形態方面的認同感，從而在消融民族文化差異、消除民族意識隔閡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佛圖澄與石氏父子有著不同尋常的關係。石勒稱帝後，事澄彌篤，有事必咨而後行，並尊為「大和上」。石虎即位，更傾心事澄，有過於勒。其下詔曰：「和上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上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眾坐皆起，以彰其尊。」[註 13]更敕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以表尊敬。佛圖澄在後趙所受之尊崇可與後世「國師」地位相比。

佛圖澄正是充分利用如此殊勝之因緣，飛龍乘雲，大力向民間傳播佛教，使佛教在後趙時期得到空前的發展。史載他於後趙「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註 14]。創當時佛教東傳中原地區以來建寺最高紀錄，在中國佛教初傳期可謂「得未曾有」。《佛祖歷代通載》讚曰：「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註 15]

有佛圖澄之弘化，百姓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由此也真偽混淆，多生愆過。石虎曾針對此下書料簡。

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

朝士多同度之所奏。石虎以澄之故，下書曰：

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註 16]

這是佛教初傳期典型的「華夷之辯」論，儘管這裡沒有佛圖澄的正面抗辯，但在這場君臣論爭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到佛圖澄一默如雷的無形影響力。在這裡折射出的是以佛教「普度有情」的博大理論，去抗衡當時正統的儒者「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狹隘民族偏見。經佛圖澄不懈之努力，使佛教由一種形同「民間方術」的流傳方式一躍而居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並逐漸成為各民族所認同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對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這裡應特別突顯的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統治者明令漢人可以出家從此開始。對佛教的弘傳來說，這一步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所以荷蘭著名漢學家許理和評論說：

這裡最明顯的事實是佛教在這個半漢化的「蠻人」和漢人雜居的世界中迅速發展，如果我們把它和佛法在南方士族和皇族中緩慢而又痛苦的發展過程相比較，就看得更清楚。[註 17]

這不僅使佛教的弘化取得了國家政權保護的合法性，更為中國佛教僧團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人可弘道，僧伽是佛法的直接傳播者，從此僧團被賦予一種新型的意識形態上的合理性。所以從佛教的傳播角度說，佛圖澄成功地利用國家力量來弘揚佛教，開拓出一條全新的弘法之路。佛圖澄對佛法的推廣，客觀上促進了我國北方中原地區的民族融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後趙境內的相對安定，使後趙在不太長的時間裡成為十六國時期國力較為強盛的政權之一。

### (三)育才興化 法源濫觴

佛圖澄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宗教活動家，也是一個優異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但因在《高僧傳》及相關史料中敘述他的神通事迹頗多，所以周叔迦先生感慨說：「他的義學和戒行反為神異事迹所掩。」並說：「佛圖澄的學說，史無所傳，但從他的弟子如釋道安、竺法汰等的理論造詣來推測，佛圖澄的學德，一定是很高超的。」[註 18]同樣，芮沃壽 (A. F. Wright) 在其所著《佛圖澄傳》中也認為「如果他處在一個不那麼動盪的時代，無疑也是一個譯經和義學大師」[註 19]。

其實佛圖澄之神異，只是以善巧方便來推動佛法之普及，如《高僧傳》載：「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註 20]這是由佛教初弘期的境遇所決定的，非神異不足以鎮愚頑，所謂：「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註 21]湯用彤先生在論及魏晉佛法之盛時總結說：「然佛教之傳播民間，報應而外，必亦藉方術以推進，此大法之所以興起於魏晉，原因一也。」[註 22]佛圖澄一生所致力的是為佛法的弘

傳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他的真正貢獻是為中國佛教埋設了燎原之火種，使佛教一樹百獲，大顯於中土。

佛圖澄無疑是一位學問淵博、知見超群的高僧。他自幼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來洛陽時，雖未讀此土儒史，但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若符契，無能屈者。《高僧傳》說其「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註 23]。佛圖澄在弘法之時，十分注重個人戒德修持，「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註 24]。因此贏得中原及西域地區僧俗的敬重，當時有不少人慕名投其門下受學，「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註 25]。當時受業追遊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近萬人。佛圖澄之所在成為當時著名的佛教弘化中心。在弟子中，名見於經傳者諸如：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道安、法雅、法汰、法和、僧朗、安令首尼以及佛調、須菩提等，皆一時之秀，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一方領袖，對佛教在中華大地的傳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如道安成為「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的教團領袖和「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的劃時代的人物。僧朗領導的泰山僧團，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受到普遍的尊敬，苻堅時沙汰僧尼，特下詔，僧朗僧團不在其列。竺法雅曾與康法朗一起創立了「格義」理論，對佛教教義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比丘尼安令首博覽群經，建寺五所，影響廣泛，從其出家者有二百餘眾。道安門下，更有廬山慧遠最為著名。古德讚云：

法源濫觴之初，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而得遠公。[註 26]

《高僧傳》卷八評論師徒三人時說：

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餘輝，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閭浮之地，湧泉猶注，寔賴伊人。[註 27]

佛圖澄創業垂統，永光無窮。正是由於其門下弟子的努力，使佛教在北方始終保持了強勁的發展勢頭。

晉穆帝永和四年（三四八）十二月八日，佛圖澄示寂於鄴宮寺，世壽一百一十七歲。士庶悲哀，號赴傾國，窆於鄴西紫陌（今河北臨漳鄴鎮西部）。在《全唐詩》卷八〇八中有唐代慧宣法師所寫〈奉和竇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竺佛圖澄〉詩：「大誓憫塗炭，乘機入生死。中州法既弘，葛陂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鏡徹千里。道盛咒蓮花，災生吟棘子。埋石緣雖謝，流沙化方始。」非常精煉地概括了佛圖澄弘法濟眾的一生。

## 二、佛圖澄在山西弘化遺迹

佛圖澄在中國北方活動的區域大約在現今的山西、河北、河南一帶（佛圖澄河北之遺迹請參閱高士濤先生所撰〈大法東來，至澄而盛〉一文[註 28]）。如前所述，佛圖澄於永嘉四年（三一〇）來洛陽，遭永嘉之亂，「乃潛澤草野，以觀世變」。一直至永嘉六年（三一二）二月石勒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北）時，他才潛龍出世，面見石勒。《高僧傳》載：「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風雲際會，一代聖僧與一世梟雄成就了中國佛教傳播史上的一段因緣。那麼，從洛陽出走至葛陂見勒，也就是從永嘉四年（三一〇）十月至永嘉六年（三一二）二月這一段時間裡，佛圖澄潛居在什麼地方呢？《高僧傳》與《晉書》只是籠統說「潛澤草野」。那麼，這個「草野」之地在哪裡呢？又是什麼因緣促使「以觀世變」的佛圖澄及時把握時機去面見石勒呢？當時群雄競立，逐鹿中原，為什麼佛圖澄所見是石勒而不是別人呢？所以如果能找出佛圖澄隱居之地，並分析當時政治、軍事發展態勢，其實也就破譯出佛圖澄之所以會面識石勒並輔佐後趙三十餘年這一段因緣的契機。

數年前，筆者致力於《山西佛教文化資料庫》的建設，曾於山西境內多方考察寺廟遺址、石窟、碑刻遺迹，以及古德先賢之仙蹤道影。現僅據所收集資料分析，竊以為佛圖澄由洛陽至北地，首先落腳的地方應是太行山西麓的武鄉縣。筆者僅從以下方面說明：

### (一)地方史文獻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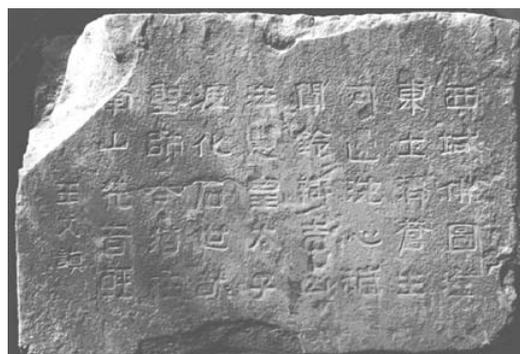
1. 《山西直隸沁州志》（康熙十三年版）「仙釋」有《佛圖澄傳》，記載「避難武鄉，依石勒、石虎，號大和尚」。
2. 《武鄉縣誌》（乾隆版）卷之三「仙釋」中亦載有《佛圖澄傳》，其中記有「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避難武鄉」。
3. 《沁州志》（光緒版）卷七「仙釋」有《晉佛圖澄傳》，記載「按《晉書》本傳不言澄到鄉郡……，本州舊志稱澄避難武鄉」。
4. 《武鄉新志》（民國版）卷之四也在「仙釋」篇中列有佛圖澄。

## (二)地方金石資料

在實地田野考察中，我們發現有大量的碑刻資料：

1. 普濟寺出土北魏造像殘碑。此碑質地為細麥積石，碑長七十釐米，寬六十釐米，厚十一釐米。碑正面有佛像三十一軀，背面有字，多漫漶不清，但其中有「勒為皇」、「創建西寺南山茅蓬佛圖澄」等字樣。

2. 南山茅蓬寺遺址出土北魏·王文謨詩碑（圖一）。質地為紅砂岩，碑長七十釐米，寬四十六釐米，厚十五釐米，左上角殘。詩曰：「西域佛圖澄，東土濟蒼生。河邊洗心穢，聞鈴辯吉凶。法惠皇太子，渡化石世龍，聖師今猶在，南山梵音輕。」王文謨，據乾隆版《武鄉縣誌》卷之三「人物篇」載：「北魏·王文謨，道武帝時人，嘗為東道行軍總管、善州刺使諸軍使，著有政績，封燕國公……。」此碑也點出了佛圖澄與武鄉南山的因緣。



圖一：王文謨詩碑

3. 唐高宗李治調露元年（六七九）〈大唐重修茅蓬寺碑〉。此碑於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在武鄉南山茅蓬寺遺址出土，質地為黃砂岩，通高二米，碑身一·七七米，下寬〇·七八米，正面碑文局面風化，左邊有人為砸擊痕迹，右邊完好，邊刻卷草紋圖案。現存武

鄉縣文物管理所。

碑文：

原夫至道虛凝，聖教秘曠，循迹可語，就體難名。自金人覺悟，群生幽光，攘攘四生，因之以登正覺；攸攸□□，□此而去塵羅。神化圓通，十方歸一，法道潛被，三途不墮，寶雨天華，浮曜流暉，光照赫奕，非可言陳。□鄉□有南山，歸巍嵯峨，對峙如闕，青嵐瞳矓，丹岩崢嶸，茂林森鬱，層簷凌空，昔天竺佛圖澄大和上說法道場也。□□□妙，霞生茅蓬之台；蕩蕩光明，月滿法輪之座。華蓋覆像，皆垂交露之珠；玉砌拱龕，盡飾真珠之寶，慈舟永泛，□偈恒流。聖師竺佛圖澄，於晉永嘉四年，東行洛陽，普濟眾靈，逢時大亂，聖道不行，遂隱南山，結茅修持，隨相□體，靜觀世變，行洗穢、辯鈴、誦咒、役鬼、醫死、卜吉之神通。遐邇轟傳，奉者如雲，遂至窮鄉僻

壤，寺立如林。曾□□趙皇石勒，敕封大和上。即為歲月深遠，妝彩幽微，莊嚴凋零。屬大唐上元元年，惠政弦歌，大德彰炳，裝飾宇□，津梁世界，禮樂更新，雅頌汙溢，於是廣興塔廟，紹隆三寶，有詔復興斯寺，合僧眾三十三人並士女等，結念道□，追摹餘軌，粵以調露元季三月一日，各舍淨財，祥集眾寶，選求妙工，遂重修茅蓬古寺。以斯功德，普及有情，同此福田，齊成覺道。合僧眾三十三人名：道成、慧明、王福海、孫懷珍、劉金旺……。



圖二 南山茅蓬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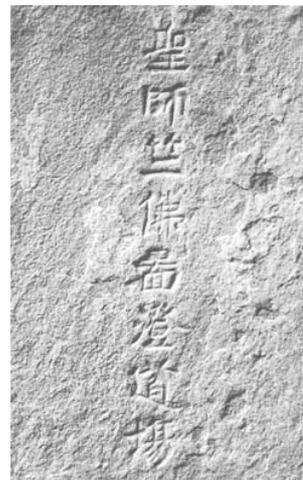
由碑文「聖師竺佛圖澄，於晉永嘉四年，東行洛陽，普濟眾靈，逢時大亂，聖道不行，遂隱南山，結茅修持」，可看出佛圖澄是避難於武鄉南山，並建有茅蓬寺（圖二）。南山，位於武鄉縣城南，坐北向南，背山臨流，與故縣村（原武鄉縣治所在）隔河相望，是一景色絕佳之處。有詩讚曰：「皐狼巽隅古南山，雙龍雙虎勢不凡。後枕焦王仙遊嶺，前瞰漳水且回瀾。」茅蓬寺，唐會昌法難後改為「普濟寺」，當地鄉民習慣稱「南山寺」或「佛圖寺」。

4.南山茅蓬寺遺址八角池內出土唐·孫顥詩碑。一九九七年秋出土，此碑質地為黃砂岩，長六十八釐米，寬四十八釐米，厚四釐米，左下角殘。共有詩二首。其一為：「山圍茅蓬鎖雲霓，正是佛圖坐禪時。當年仙鶴歸何處，至今猶傳錫卓池。」其二為：「昔有佛圖拋袈裟，頓作神井鎮百煞。每逢旱魃魚化龍，甘霖一滴潤禾稼。」這兩首詩署名為孫顥。據乾隆版《武鄉縣志》卷之三「人物篇」載：「唐·孫顥，字子摻，其先富陽人，遠祖因官武鄉，後遂為鄉縣人，唐時縣尚名鄉，顥退不絕俗，進不邀榮，官朝議郎，唐永昌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實嗣。」這兩塊詩碑皆揭橈了佛圖澄在南山活動之行迹。

5.南山茅蓬寺遺址出土唐·李寧詩碑。此碑質地為黃砂岩，碑長七十釐米，寬四十五釐米，厚八釐米。詩曰：「南山清幽古木森，今隨殿下謁茅蓬。來日若邀群仙會，主人定賴佛圖澄。」落款為「李寧景龍戊申」。李寧為唐時鄉縣（今武鄉縣）磚壁村人，曾為縣令，有惠政。景龍為唐中宗年號，戊申年為景龍二年。據載，唐中宗景龍二年（七〇八）四月，李隆基時兼任潞州別駕，曾至南山巡視，由縣令李寧陪同。

6.南山茅蓬寺遺址出土清·了世和尚詩碑。此碑質地為紅砂岩，碑長七十釐米，寬四十五釐米，厚五釐米。詩曰：「西域佛圖澄，南山居茅蓬，北原輔石趙，弘法濟眾生。」落款為「南山僧人了世，清光緒丁未立」。釋了世，為武鄉縣長樂村人，清光緒時，為南山普濟寺住持。

7.南山茅蓬寺遺址出土〈聖師竺佛圖澄道場碑〉(圖三)。此碑於一九五八年春在南山聖師堂出土。質地為黃砂岩，碑長七十釐米，寬四十五釐米，厚五釐米。



圖三 聖師竺佛圖澄道場碑

(三)遺迹

在南山考察時，還發現有多處傳為佛圖澄的遺迹。

1.南山茅蓬寺遺址的「聖師堂」(圖四)。聖師堂有金代進士王師正所撰楹聯：

南山初祖天竺高僧佛圖澄  
堂前賓客後趙聖帝石世龍



圖四 復建中的聖師堂

2.南山茅蓬寺遺址的「北閣」。唐·李師行曾撰聯：

南山茅蓬寺初佛圖澄  
北原文昌閣閣始石勒皇



圖五 佛圖井

3.南山茅蓬寺遺址的「卓錫池」。清乾隆時，卓錫池以「兩池映月」被列為南山二十四景之一。清代鰲山書院主講、鄉人魏守經有詩讚曰：「明月松間來，幽人池上臥。雙松映雙池，一池月一個。」

4.南山茅蓬寺遺址的「佛圖井」(圖五)。此井被列為南山二十四景之一，歷史上不少文人墨客於此留詩作賦。《武鄉縣誌》中有

大量此類詩文。

5.南山茅蓬寺遺址的「淨隣石」(圖六)。《晉書》載：澄「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註 29]。當地相傳李隆基曾題有隸書「洗心」；三晉名士傅山曾題「淨隣石」三字。鄉人楊德修有〈南山四詠·淨隣石〉：「峻層磊落天工裁，回瀾漳水過壁崖。我勸遊人且留步，亦學佛圖淨隣來。」



圖六 淨隣石

6.佛圖澄「說法台」。李師行有〈遊五峰寺〉詩：「五峰出岫四壑藏，殿閣森嚴古道場。佛圖昔坐說法台，法顯今化枯木堂。雪山慧燈耀四極，延生溫泉潤八荒。到此頓覺心如洗，了悟波羅興致長。」李師行為唐時鄉縣(今武鄉縣)磚壁村人，曾官至陝西延州司馬。楊德修〈南山四詠·說法台〉：「閑遊策杖南山來，仰瞻佛圖說法台。寄語後人還到此，便知法界廣無垓。」



圖七 梓里源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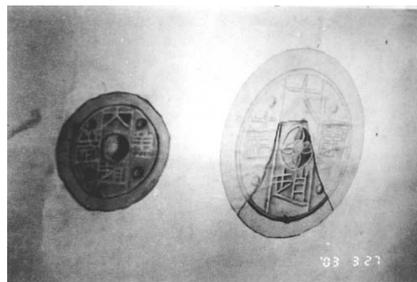
#### (四)出土的部分文物

在考察中，我們還發現有許多與佛圖澄及石氏相關的實物。



圖八 出土的磚雕

- 1.南山原石勒祠石刻門匾「梓里源淵」(圖七)。
- 2.南山普濟寺磚雕門匾「普濟蒼生」。
- 3.南山出土的磚雕(圖八)。
- 4.南山出土的後趙國「大趙萬歲」銅幣(圖九)。
- 5.南山出土的北魏正光年間石刻造像(圖十)。
- 6.原普濟寺舊址遺存的「丈八佛」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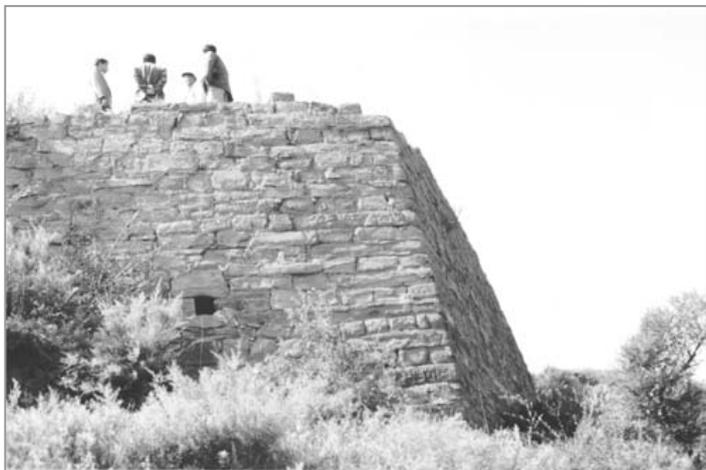


圖九 大趙萬歲

與佛圖澄和石氏相關的遺迹，在武鄉南山一帶隨處可以觸摸到。如南山之北，一峰雄峙，名曰北原山。石勒正是生於北原山下東河溝的一戶羯族人家。明崇禎進士、本縣信義村人程啓南有〈詠石勒故里〉詩：「人傑地靈北原山，藏龍臥虎氣不凡。石勒故里今猶在，逐鹿燕趙威名傳。」後來石勒做了皇帝便將北原山改為「鞏



圖十 北魏造像



圖十一 石勒兵寨

山」。如今山上仍有石勒兵寨遺址（圖十一），與南山隔河相望。史志載，石勒兵敗幽州，投奔劉淵後就屯兵於此，準備攻打上黨。石勒兵寨又稱為石趙古城，它面臨濁漳河，雄居北原山，南低北昂，水繞山環，西有八角山，東靠先農壇，兩山猶如鳥翼，古有「鳳凰城」之稱。這裡除築有城池外，還有龍門、石勒行宮等。石勒兵寨下的南亭川，有石勒和大將郭黑略的「演武場」、「點將台」和「旗杆石」。石勒寨西十里有石勒當年的牧馬場，即今「馬牧村」，

村邊的小河亦得名為「牧河」。縣北十里的趙王村有傳說中的「石勒墓」，金元間著名詩人郝經有〈石勒墓〉詩：「都門長嘯氣憑陵，瓜割中原霸業興。夜莽山間誰得見，至今猶有守墳僧。」南山有石勒祠。縣東三十里石泉村有「海神廟」（清時改為「後趙聖帝廟」），祀奉石勒與佛圖澄。正殿原有明代進士任原所撰對聯：

武邑一人至今因功不朽  
天竺帛氏昔歲輔趙留芳

聯中充滿對佛圖澄輔弼之勳的讚揚。

每年農曆七月二十一（石勒忌日）和臘月初八（佛圖澄圓寂日）武鄉傳統廟會都要敲鑼打鼓，用八抬大轎將石勒與佛圖澄的木雕像請下山，為其唱神戲。清代進士李華炳有〈謁石勒祠〉詩：「清明細雨灑崇台，拾級登臨祭祀來。石氏宗祠海神廟，僧捧趙印話興衰。」至今武鄉民間正月十五的「頂燈舞」仍與紀念佛圖澄有關。「頂燈舞」俗稱「頂燈」，是流傳於武鄉中東部鄉里的一種民間歌舞，它形式多樣，動作自由，極富鄉土氣息。其中的「遊黃河」，以燈布陣，設黃河為天河，鄉民載歌載舞，熱鬧非凡。清鄉人魏守經曾寫有〈南亭竹枝詞〉，記述其場面：「上元蘆席結神廟，煙火連宵氣色增。遊遍黃河三百六，沿途五色紙糊燈。」鄉民舞時所唱歌詞為：「三官（天官、地官、水官）三聖（佛陀、老子、孔子）倆高僧（佛圖澄、法顯），九曲黃河轉不停，金燈做了三百六，一年四季保太平。」當地還有民諺說：「平遙的城，上黨的門，武鄉南山的佛圖澄，離相古寺的老大鐘。」讚頌其名震三晉。在調研中我們還看到由當地民間老藝人梁國英於上世紀六〇年代依南山茅蓬寺壁畫臨摹的佛圖澄像（圖十二）。

以上資料無不說明佛圖澄當年在本地的神迹種種。這一切是否均可佐證先前筆者所提出的推論，即武鄉縣南山正是佛圖澄當年由洛陽至襄國的避難之地。佛圖澄雖然在南山未待多久，但就在這不太長的時間裡，將信仰的陽光遍灑武鄉的每一寸土地，至今溫暖猶在。



圖十二 佛圖澄像

那麼，佛圖澄為什麼會選擇武鄉作為潛居之地呢？這要從當時的天下形勢來說，西晉雖然結束了自東漢董卓之亂後出現的分裂局面，但當時的門閥勢力並不真心臣服於這一新生的中央政權，而是各有覬覦之心。至惠帝元康年間，終至爆發「八王之亂」，戰爭從洛陽、長安迅速擴展到黃河南北廣大地區，不僅給這一地區的漢族百姓帶來極大的災難，也使那些內遷的少數民族群眾飽受戰亂之苦。由此暴亂四興，各地紛紛起兵反晉，建立割據政權。永嘉二年（三〇八）匈奴貴族劉淵在平陽（今山西臨汾）稱帝；四年，劉淵死，子劉聰繼位，翌年派石勒殲滅晉軍十餘萬人，同年匈奴兵攻入洛陽，俘懷帝，百官士民死者三萬餘人，史稱「永嘉之亂」。北方地區已盡在其勢力控制範圍。佛圖澄正是於這一時期入晉。其時石勒已是劉淵部將，且在戰爭中不斷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石勒為武鄉縣人，當時武鄉正是石勒屯兵之地，亦可謂日後的「龍興之地」。《武鄉縣誌·兵防》之「武事篇」載：「山右古稱用武地，武雖彈丸，而南北實為沖要。」從常理上推斷，在石勒的駐防之地，再亂也不可讓「後院失火」。所以從戰略上說，當時在距洛陽不太遠的範圍內，武鄉應是一個安全的潛隱之地。這從石勒據襄國後，專門接待鄉親時的言談中就能看出：「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sup>[註 30]</sup>這是其一。

其二，佛圖澄的潛藏遠遁，並非為草間求活，其實他是在「潛澤草野，以觀世變」。當時群雄並驅中原，究竟鹿死誰手？天下人拭目而觀。在這場角逐中，石勒的確表現出非凡之處。如在文化上，他重視漢族文化和重用漢族知識分子。在征戰過程中，他將一些漢族士大夫組成「君子營」，以士人張賓為謀主，為其策畫軍政要略。《晉書》評曰：「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sup>[註 31]</sup>

永嘉六年（三一二）石勒徙據襄國的戰略大轉折，便是採納張賓之議。在經濟上，他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與民休息。在政治上，石勒抬高羯人地位，嚴禁稱「胡」，號「胡」為「國人」。在處理民族信仰矛盾上，他允許軍民人等有樂事佛者，悉聽為道。為不同民族之間的精神差異提供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認同感，這在當時是要有一個政治家的眼光與氣魄的。他在劉曜建立前趙後，就敢與之斷絕君臣關係，並欲自己稱帝，這也要有一種「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的君王氣度。佛圖澄審時度勢，看中的正是石勒的「王者之氣」。正如《晉

書》所載，張賓未遇石勒時曾歎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註 32] 後披露自己追隨石勒之心迹說：「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指石勒）可與共成大事。」[註 33] 同張賓一樣，石勒政權正是佛圖澄在「以觀世變」中所斷定並期待能倚重的勢力，所謂「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註 34]。所以佛圖澄在石勒未稱帝前就敢斷言「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此斷語可謂深謀遠慮，其中對石勒也抱有無限期許。

其三，從弘法的方便上說，以長安與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大地當時已有相當傳教基礎，佛法的傳佈多有展開。武鄉位居長安與洛陽之間，地理位置優越，資訊獲取便利，即使在戰亂之際，也可為韜光俟奮之地，佛圖澄遂於此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十分有意味的是，在佛圖澄圓寂後十餘年，因前燕慕容雋之死引起宮廷內訌，鄴都騷動，澄之弟子道安離鄴出走，所選擇的避難之所也是離武鄉很近的濩澤（今山西陽城縣）一帶山區。[註 35] 在中原佛教傳播史上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其四，從度眾的意義來說，當時中國北方「五胡亂華」，生靈塗炭，正是民眾最有宗教需求之時，也是一個傳教者大有可為之機。而石氏父子正是暴戾恣睢之人，化凶拯苦、濟世安民成為當下之要務。從《高僧傳》記載看，這彷彿也是佛圖澄面諫石勒的直接原因。所以從以上幾個方面綜合來推論，佛圖澄好謀善斷，選擇赴武鄉避難當不失為一種睿智之舉。其時，佛圖澄年屆八旬，歷練老成，洞悉世事，對南北分裂、群雄割據的政治形勢以及石趙內部情形瞭如指掌，所以他會做出這一依附石趙來推行法化的決斷。當然這只是筆者的妄測。如果這一推論成立，那麼，正是因為佛圖澄避難武鄉，方可耳聞鄉間對石勒雄才大略的種種傳說，加之目睹石氏軍隊的暴虐無道，所以才會有「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的因緣。這裡確有一個非常有意味的歷史假設，如果當時佛圖澄避難的不是武鄉而是其他地方，佛圖澄會去勸誡石勒嗎？歷史上還會有聖僧佛圖澄輔佐石趙、創佛法弘化盛績豐功的故事嗎？看來所有一切確有一個「緣」在。

本文以為，考察佛圖澄潛隱之地不僅對研究佛圖澄本人有著特殊價值，就是對中國佛教史也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儘管說佛圖澄在武鄉的時間不長，但卻是他面見石勒的重要起因，由此也決定了他後來輔佐石趙三十餘年的經歷，並有了建寺千座、授徒萬人的輝煌，實現了在民眾信仰領域將佛教提昇為主流意識的宏願，開創出中國北地特有的依附皇權推廣法化的弘法範式，這為日後道安「依國主而立法事」的傳教行化鋪設了藍本，也為佛教的中國化鑄成了模範。可以說，如果沒有佛圖澄隱居武鄉的這一段因緣，中國佛教初傳期的歷史也許要重新改寫。

總起來說，本文所列資料並不系統，論證亦難說就是定論，權作一說立案存疑。歷史真相究竟如何？由於沒有更多直接的資料，無法作進一步的考證。筆者撰文之初心亦並非定要證明什麼？只是想將所收集之材料奉獻於學界與教界，以期為有識之士日後研究提供些許參考素材。

令人無以忘懷的是，在考察中我們還拜訪了當地的地方史學者與鄉里老人，他們追根溯源，娓娓道來，使我們聆聽並搜集到許多有關佛圖澄在當地的神異故事與傳說，因篇幅關係，此處我們無法一一演繹。無論這些傳說如何的離奇不經，我依然感恩於這片滾燙的土地與純樸的鄉民。當得知你是來查訪佛圖澄的，他們會喜不自勝、急不可耐地講出所知的一切，如道家珍；當你有要尋訪佛圖澄足迹的意願流露，他們馬上便放下手中的活計，引領你去踏訪他們認定之所在。而當你對某一點提出質疑時，他們又會表現出倔強的辯白與明顯的困惑：



圖十三 溫金玉(左一)考察圖

爲什麼連「老輩人傳下來的話」你都不信？他們對你做學問的能力與方式反倒產生了懷疑，那種對「書呆子」的不屑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所有的理由與根據就是生於斯、長於斯千百年來口耳相傳的故事與傳說。這是一種典型的固執鄉土情結的民間民俗信奉的形式。從筆者來說，往常總是習慣於文本典籍的檢索，如今考察佛圖澄遺迹也算是一種民間信仰的社會學調研的方法論嘗試（圖十三），所以我要真誠地感謝爲此文的寫作給予過任何幫助的人。

### 【註釋】

[註 1] 《魏書·釋老志》載：「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菴國就羅漢入道。」

[註 2] 《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三頁中。

[註 3] 石勒自小隨人當過小販，也曾爲人力耕，後爲並州刺史司馬騰捕捉，賣與荏平（今山東東阿北）師權爲奴。後爲晉軍所迫，招集王陽、夔安以及郭敖、郭黑略等十八人劫掠爲盜，號稱「十八騎」。

[註 4] 見同 [註 2]，第三八三頁下。

[註 5] 《晉書·石季龍下》。

[註 6] 同 [註 4]。

[註 7] 同 [註 2]，第三八五頁上一下。

[註 8] 同 [註 2]，第三八六頁下。

[註 9] 同 [註 2]，第三八七頁上。

[註 10]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五十三冊，第五一七頁下。

[註 11] 《佛祖歷代通載》卷六，《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五二二頁中一下。

[註 12] 湯用彤，〈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一三四頁。

[註 13] 同 [註 2]，第三八四頁下。

[註 14] 同 [註 9]。

[註 15] 同 [註 11]，第五二二頁中。

[註 16] 《晉書》卷九十五，〈藝術傳·佛圖澄〉。

[註 17] 〔荷蘭〕許理和著，李四龍等譯，〈佛教征服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三〇七頁。

[註 18] 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第十七—十八頁。

[註 19] 芮沃壽 (A. F. Wright)，〈佛圖澄傳〉，《哈佛亞洲研究雜誌》(HJAS) XI (一九四八年) 第三二五頁。

[註 20] 同 [註 2]，第三八五頁中。

[註 21] 《高僧傳》卷十，〈神異·論〉，《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九五頁上。

[註 22] 同 [註 12]。

[註 23] 同 [註 9]。

[註 24] 同 [註 9]。

[註 25] 同 [註 9]。

[註 26] 同 [註 11]，第五二四頁中。

[註 27] 《高僧傳》卷八，〈義解·論〉，《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三頁上。

[註 28] 河北省佛教協會主辦，〈禪〉雜誌 (二〇〇一年) 第三—四期。

[註 29] 同 [註 16]。

[註 30] 《晉書》卷一〇五，〈載記第五·石勒下〉。

[註 31] 同 [註 30]。

[註 32] 同 [註 30]。

[註 33] 同 [註 30]。

[註 34] 同 [註 27]。

[註 35] 參見方廣錫〈道安避難行狀考〉一文，《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二期 (一九九九年七月) 第一四五—一七四頁。